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Economics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 历史与理论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AND
ECONOMIC CYCLE: History and Theory

—
胡乐明
杨静
等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Economics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 历史与理论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AND
ECONOMIC CYCLE: History and Theory

胡乐明 杨静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历史与理论 / 胡乐明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 - 7 - 5203 - 2445 - 8

I. ①资… II. ①胡…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危机—研究
②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周期—研究 IV. ①F039②F0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839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文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6.25
字数 609 千字
定价 1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 | |
|--------------------------------------|-------|
| 导论 | (1) |
| 第一章 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 | (27) |
| 一 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危机 | (28) |
| 二 秩序与危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视野 | (57) |
| 三 亚当·斯密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思想渊源 | (68) |
| 结语 “铁笼”中的自由 | (81) |
| 第二章 “资本的年代”：危机理论的意识形态化 | (84) |
| 一 “资本的年代”：“自由主义时代”的繁荣与危机 | (85) |
| 二 “萨伊定律”与资本主义的无危机论证 | (107) |
| 三 马尔萨斯与西斯蒙第的危机思想 | (116) |
| 四 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辩护 | (123) |
| 五 约翰·穆勒与危机理论的意识形态化 | (126) |
| 结语 经济危机的理论批判与批判理论 | (131) |
| 第三章 批判与建构：马克思的经济周期与危机理论 | (134) |
| 一 经济和谐论的破产与清算 | (135) |
| 二 社会资本再生产视野下的经济周期与危机 | (149) |
| 三 危机形式及其逻辑演绎：历史视野下的经济危机 | (162) |
| 四 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整体性危机与社会变革 | (171) |
| 结语 验证与“在场” | (181) |

| | |
|---|-------|
| 第四章 过渡与挑战：“帝国主义”笼罩下的危机和理论 ····· | (184) |
| 一 世纪之交的生产与危机····· | (184) |
| 二 庸俗经济学的“科学”辩护····· | (206) |
| 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击与突破····· | (222) |
| 四 战后阶段：平稳发展抑或资本主义总危机····· | (244) |
| 结语 过渡时代的危机与危机理论····· | (254) |
| 第五章 崩溃的体系：大萧条及其理论纷争 ····· | (256) |
| 一 增长的难题：生产集中与经济失衡····· | (257) |
| 二 困境重重：大萧条与旧体制的没落····· | (273) |
| 三 理论纷争：关于大萧条的不同解释····· | (283) |
| 四 后续的争论····· | (295) |
| 结语 如影随形的危机与无力的辩护····· | (301) |
| 第六章 黄金年代：从大萧条到滞胀的过渡及其理论解释 ····· | (304) |
| 一 “黄金年代”的到来：经济危机的终结？····· | (304) |
| 二 主流观点的“转折”····· | (329) |
|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 | (344) |
| 结语 “黄金年代”的落幕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终结····· | (371) |
| 第七章 长期繁荣的终结：滞胀与理论的危机和危机的理论 ····· | (373) |
| 一 滞胀的到来····· | (373) |
|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 | (383) |
| 三 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滞胀危机理论····· | (390) |
| 四 西方左翼经济学的滞胀理论····· | (399) |
| 结语 滞胀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 | (408) |
| 第八章 世纪末的动荡：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危机与理论 ····· | (411) |
| 一 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开启····· | (411) |
| 二 资本主义的分化与危机的新形态····· | (420) |

| | | |
|-------------|-----------------------------------|-------|
| 三 |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金融危机理论 | (433) |
| 四 |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 (445) |
| 结语 | 新自由主义不能拯救资本主义 | (452) |
| 第九章 | 又见大萧条：21 世纪初的危机与理论 | (454) |
| 一 | 危机重重的 21 世纪初 | (454) |
| 二 | 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新一轮争论 | (485) |
| 三 | 新自由主义阶段的结构性危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新探索 | (499) |
| 结语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 (523) |
| 第十章 | 变革与替代：资本主义的出路 | (525) |
| 一 | 不是问题的问题：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吗？ | (526) |
| 二 | 经济波动与商业周期：什么是经济危机？ | (528) |
| 三 | 危机必然性的理论阐释：如何看待危机的多重根源？ | (530) |
| 四 | 危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不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样的性 | (541) |
| 五 | 危机的时间周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史 | (547) |
| 六 | 危机的阶段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演化史 | (550) |
| 七 | 危机的空间扩张：资本主义的国别经济危机与整体经济危机 | (553) |
| 结语 | 危机的未来走向 | (555) |
| 参考文献 | | (559) |
| 后记 | | (569) |

导 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然而，资本主义虽然经历了多次严重危机和沉重打击，却依然不断地发展前行甚至凯歌而行地进入了21世纪。因此，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们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与如何能够经久不衰”这样一个严峻的诘问持续地作出回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无害化”处理以“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显然，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的变迁具有内在关联，只有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演变，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尝试。

一般认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时期。^①在此时期，“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商人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尚未出现普遍的经济危机。^②但是，“资本来到世间，

^① 马克思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于16世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23页。萨米尔·阿明认为，1500—1800年的三个重商主义世纪是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应从1800年算起。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000—1820年的整个时期是“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本书借鉴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等人的观点，认为1500年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②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17页。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显然，带着血腥和肮脏来到世间的资本主义即便在其早年也不可能持续平稳协调发展，危机是其与生俱来的基因。

众所周知，英国是第一个正式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显然不应局限于生产的角度和英国的范围。^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和巨额的私人货币财富。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凡能影响上述两个条件生成的经济、政治、人口、地理乃至气候等因素，都会影响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早期形态——原始积累危机。

恩格斯指出，在这一时期，“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③。因此，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和1719年的“南海泡沫”等发生于商业、金融领域的危机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的基本形式。同时，人口数量的剧烈波动通过影响自由劳动者的供给所导致的危机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的一种基本形式。安格斯·麦迪森指出，19世纪之前西欧人口的增长不断地被时间长短不一和严重程度不同的冲击所打断，这些冲击主要由三类因素所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④ 当西欧人口增长时，贸易与制造业也随之增长；人口下降时，商业和工业也随之下降。因而总体而言，16世纪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期，17世纪则为危机（收缩）期。^⑤

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往往并不会导致“资本的毁灭”。商人资本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经济条件在一个地区恶化时，商人资本可以迅速地在其他地区找到新的落脚点，因此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鲜

①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② [英] 詹姆斯·富尔彻：《资本主义》，张罗、陆贻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④ [英]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⑤ [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4页。

明特点之一，就是经济领先优势在各国之间的阶段性轮转。^①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往往并不是表现为行业与产业的危机或衰落，而是表现为经济领导地位的更替与区域经济的兴衰。沃勒斯坦指出，一旦某国因经济危机而丧失其霸权地位，那么另一国则可能因经济危机而获得一定的霸权地位，从而导致霸权的周期循环。而且，每一轮霸权周期的兴起与衰退往往都伴有较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是新霸权周期的开始，又是旧霸权周期的结束。^②因此，为了争夺霸权地位，摆脱资本原始积累危机的威胁，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战争几乎从未中断。

同时，为了摆脱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③。“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一方面，通过暴力剥夺国内农民土地，迫使农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通过血腥法令使之进入雇佣劳动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掠夺贸易、贩卖奴隶等手段促成了私人货币财富的大量积累，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曼德尔指出，从16世纪到18世纪，以遭受劫掠地区的日益贫困化为代价，西欧国家的价值及资本国际集聚日益增长。1503—1660年，拉丁美洲向欧洲输出了价值五亿金比索的黄金和白银；1650—17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攫取的财富高达六亿金盾。^⑤

然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亚当·斯密等人那里却被呈现为“田园诗式的东西”，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论题下完成了“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证明。但是，在斯密之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者看来，“权力与财富缺一不可”，必须以经济实力提升国家实力，以国家权

① [英] 詹姆斯·富尔彻：《资本主义》，张罗、陆贻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② 参见[美]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但是，与沃勒斯坦所认为的荷兰霸权、英国霸权、美国霸权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三个霸权周期不同，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霸权周期应该有四个：热那亚霸权（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荷兰霸权（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英国霸权（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霸权（19世纪末至今）。参见[意]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7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⑤ [比]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8—59页。

力稳定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控制殖民地、主导贸易规则，实施合理的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市场，同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和减轻国内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及其所导致的就业不足和价格波动的损害。^①与重商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顺应工业资本主宰时代到来的需要，斯密剥离了货币和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他那里，自由市场规则会引导资本之“自发而不可抗拒的发展”，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使得所有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得几乎相同水平的“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秩序的实现”与“均衡的达成”^②。

显然，马克思以其“资本的限制在于资本自身”的逻辑否证了斯密之“资本的逻辑”。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本人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于16世纪，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是在马克思之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商业资本主义往往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而忽略并造成了理论的“断裂”^③，“重商主义时期的扩张、危机、萧条和周期现象”也被视作“一种特殊问题”而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框架之外。^④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随意裁剪历史注定导致理论的偏颇。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制度的早期发展，我们就很难理解主宰当今世界的公司制度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原始积累不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是各个国家通往资本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我们也很难理解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危机以及世界的不平衡发展。曼德尔指出，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不仅不具备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背景或手段，而且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资本

① [英] 罗杰·E.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史》，莫竹芬、袁野译，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76—136页。在一定意义上，重商主义应被视为消费不足论的先驱，而且朴素地表达了大卫·哈维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意蕴。此外，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等法国学者也讨论了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以及资本的负积累和积累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提出了比例失调论的初步观点。

②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

③ [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④ [埃及]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继续积累，因而往往难以摆脱原始积累危机的阴影并实现经济的发展。^①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危机及其引发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很难科学而不是机械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当代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哈维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反抗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在世界许多地方目前的状况仍然如此，因此如同中国革命所成功证明的那样，必须注重阶级联合以及反抗剥夺的斗争与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②

二

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时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相继展开，规模相对较小的机器大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与组织薄弱的雇佣工人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由单领域、局部性、偶发性的现象演变为多领域、世界性、周期性的现象。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无危机发展论”经由“萨伊定律”成为自由资本主义信徒的永恒信条，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以及西斯蒙第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依据各自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理”。

英国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在1788年的英国棉纺织业危机之后，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1819年相继发生了单领域、局部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展，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

① [比] E.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大卫·哈维沿袭卢森堡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限制在早期的某个时点是错误的，必须严肃对待贯穿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原始积累”（参见[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330页）。毫无疑问，掠夺、战争等仍然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资本积累危机的手段，但是哈维等人显然误读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混淆了资本积累与摆脱积累危机的手段。

② [美]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336页。需要指出的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的斗争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已经频繁发生。例如，1539年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印刷工人罢工，并于1541年波及巴黎，在1567年和1571年这两个城市又爆发了进一步的冲突。

危机的波及范围不断扩大，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1825年爆发，终结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波的上升阶段。^①自此，周期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相继爆发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其间，经过1826—1847年的第一个长波的下降阶段的结构调整尤其是“铁路时代”的到来，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进入1848—1873年的第二个长波的上升阶段。^②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日趋频繁和严重，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也日益加剧。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工人运动，既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应性调整^③，也唤起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现实性期待。

然而，“斯密式和谐社会的蒸发”并未改变斯密的追随者们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信仰。J. B. 萨伊认为，“商品的支付手段仍是商品”，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销售越容易，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的手段”，“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否则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显然，“萨伊定律”旨在“清除”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扩展的“障碍”^④。李嘉图不仅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萨伊定律”，而且认为即使存在对外贸易，也丝毫不会干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积累的资本无论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⑤。不过，李嘉图也指出，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经

^① 大多数学者都将第一个长波即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开端定于1790年左右，但是对于它的高位转折点则存在很多争议，W. W. 罗斯托等人认为是1815年，德·沃尔夫和曼德尔等人则选择了1825年。参见[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②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页。

^③ 19世纪上半叶，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工会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以英国1799—1800年推行的《结社法令》为标志，政府彻底禁止或镇压工会；第二阶段，以英国1824—1825年废除《结社法令》为标志，政府对工会采取有限的容忍；第三阶段，给予工人阶级男女平等的完全法律权利，可以组织、从事集体活动。参见[美]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④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4—145页。秉承斯密传统，萨伊继续剥离政府和货币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系，甚至认为正是“政府”与“货币”等诸多制度因素构成了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⑤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楠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趋于停滞，从而进一步地为自由贸易“清障”。与李嘉图的“悲观”论调不同，约翰·穆勒通过对于经济危机的“无害化”处理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承诺”。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家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他们“承诺”了一种仅有“前进状态”的经济过程，其实危机与停滞状态是文明进程的一个必要阶段，是“增长的伴生物，而非衰落的标志”，因此即使在危机时刻仍旧“应该将公共权力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①。

与“主流”的观点不同，西斯蒙第以其鲜明的“消费不足论”开启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②。“斯密—李嘉图学派认为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因而他们忽视了实现问题；与此相反，西斯蒙第则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了首位。对李嘉图及其门徒来说，经济过程是一个均衡状态的不中断的链条，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是经由自动‘适应’来实现的；相反地，西斯蒙第则集中注意到这种过渡，即经济危机。”^③在他看来，外部市场和国际贸易并非应对消费不足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一般方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必须寄望于政府执行的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其他改革。与西斯蒙第一样，马尔萨斯也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过，与西斯蒙第不同，马尔萨斯认为不是劳动者的收入过低而是生产阶级的过度储蓄导致了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危险必须维持一批“非生产性消费者”——地主阶级的存在和扩大，同时适当地增加“政府的挥霍”^④。

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既不同于斯密及其追随者，也不同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

① [英]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金镛、金熠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699、882页。

② 一般认为，西斯蒙第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不足论的先驱。其实，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于1819年出版之前，英国的詹姆斯·梅特兰·劳德戴尔于1804年出版的《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的探索》便已经提出了消费不足论的基本观点。

③ [俄] 阿尼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晏智杰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④ [瑞士]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8页。

的矛盾及其具体表现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深化发展，必然会使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更加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经常地难以得到满足，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即消灭大量生产力、夺取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以及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危机的办法，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和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深化发展的“助推器”，并推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以及人类社会“采取新的历史形式”^①。

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②

马克思曾经构划了一个庞大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六册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只是大致完成了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和所述内容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未能全面综合和具体概括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充分展开，从而达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终点——“世界市场危机”^③。因此，我们必须将不同层次的“危机”区别开来，既要避免以危机的“要素形式”或“抽象形式”机械地说明现实的危机，也要避免以分析周期性危机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总体运动及其结构性危机与制度性危机，从而以适当的历史、结构和空间维度科学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是“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我们必须完善马克思的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理论并透过信用关系的具体运动去探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发过程，避免受困于机械的“生产决定论”并固守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完全不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② 马克思是否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以及一个怎样的经济危机理论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典型的观点有三种：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危机理论，只有一些零散的观点和论述；马克思已有完整系统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只是经济危机的一般理论，即抽象的危机理论。参见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68页。

^③ 刘明远：《“六册结构”视野中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

虑信用关系与金融制度而把危机的生发原因归结为与货币和信用无关的现象。现代资本主义也是“越出国家界限”的总体性存在，我们必须打开“封闭”的危机模型探寻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发展的交互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的内生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及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崩溃”显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揭示劳资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的交互关系。

三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晚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展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代表着股份公司二次方和三次方”的新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伴随着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劳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社会结构的演变，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与经济危机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家的“无危机发展论”经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数学化改造成为“科学”的信仰，但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颠覆了这种“信仰”并致力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现实性探索；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停滞”和“崩溃”的“乐观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改造”之后，关于“黄金年代”以及“资本主义为何与如何能够经久不衰”的多样化探寻成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研究的主题。

1873—189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充满剧烈的结构变动的萧条长波。^①“死气沉沉的萧条”，频繁而深刻的危机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相互交替，是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产业革命的扩展、产业结构的演进以及垄断组织的兴起，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了长期萧条的泥潭，并进入了1893—1913年的扩张长波。其间，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到1896年才进入新的高涨，并以此作为一个低位转折点。其实，对于每一轮长波的高位和低位转折点，学者们往往都有不同的意见。参见〔荷〕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卡特尔成为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①，英国霸权周期开始转向美国霸权周期。此后，随着1913年危机的爆发和“美好年代”的终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广泛的革命与严重的危机相交织的混乱而动荡的新一轮的萧条长波。其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主宰并推动国家干预主义替代了经济自由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以及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工人阶级谈判力量的提升推动了劳资关系的缓和，美国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逐步确立构筑了资本积累的“国际环境”。这样，随着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步入了长达20余年新的扩张长波。但是，与以往一样，“战后繁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危机的消失而是仍然包含大大小小的各类危机，并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终结了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危机和萧条十分明显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继续为“萨伊定律”辩护仍然成为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科学”追求。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拉普拉斯”的瓦尔拉斯首次以数学形式表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并将导致经济体系每个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均衡”，从而模型化地表述了斯密的“无形之手”。致力于创立“效用与利己心的力学”的杰文斯则以其“太阳黑子说”将危机“外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矛盾，努力维护“任何干扰不会阻止经济体系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的信念。作为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尽管对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心存疑虑，但是也以其“局部均衡”重申了萨伊定律。在他看来，“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少数企业的破产，而是许多信贷没有坚实的基础”，信用陷入混乱的原因则是源于公众由于知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盲目信任和不信任。^②显然，马歇尔承袭了穆勒的观点，将经济波动视为价格机制的正常作用受到心理等偶然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暂时失调。此后，马歇尔的观点长期主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思考，阿瑟·庇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5页。

^② [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叶元龙、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8—279页。